

4 中國效應對台港民眾政體評價的影響：政體競爭觀點的初探

林文正 林宗弘

引言

公民文化或政體績效對民主制度的影響是政治學界的長青議題。Linz 和 Stepan (1996) 認為，民眾與菁英在民主轉型後必須支持新體制的規範與信念，甚至將民主體制視為唯一的遊戲規則 (only game in town)，而民眾在此共識下才能促進民主政體的鞏固。確實，研究後共產國家的學者發現，民眾對民主體制的偏好與信念，影響着新體制是否鞏固。在政治轉型過程中，民眾會不斷對新舊政權的輸入與輸出進行比較，進而形成競爭政體 (competing regimes) 的意識，同時也需要有相當程

* 本文使用資料採自 2013 與 2016 年的「中國效應研究」電話調查。該民意調查是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共同設計與同步進行。台灣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SRDA (<https://srda.sinica.edu.tw/>)。作者感謝上述機構與人員提供資料協助。

度的民眾支持新政體，才能避免舊政體復辟 (Rose, Mishler and Haerpfer, 1998)。然而，過去競爭政體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國家內部的威權轉型過程中民眾對政體態度的變化，很少探討該國家或地區民眾對其他周邊實存政體表現的評價。台、港與中國大陸的特殊關係，給我們一個獨特的機會，探討另一個實存而且聲稱擁有主權的政體，對個人評價執政績效與政治社會化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影響下，國與國、地區與地區的政經交往，也可能會成為民眾比較政體表現的資訊來源。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發現，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政經交往將會促成民主政體轉型，與民主國家的合作將會穩固雙方關係，並對非民主國家的民眾產生示範作用，使民主價值影響非民主國家民眾的政治態度 (Huntington, 1991)。¹ 然而，這種民主價值擴散有目的論的嫌疑 (Carothers, 2002)，例如與威權政體政經往來，會不會使得民眾變得更仰慕威權體制？顯然，台港與中國大陸關係是個有趣的研究案例，可以讓我們深究反向的影響關係。

從現實來看，中國大陸與台灣政府互不隸屬，台灣在民主轉型之後已經歷三次總統選舉與兩次政黨輪替 (two-turnover test)，達到學術界所認定的民主鞏固的標準 (Rustow, 1970; Huntington, 1991)；相對的香港民眾則是自 1997 年港英政府回歸中國以來，便成為隸屬於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雖然官方宣稱採取「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治理模式，事實上，中國政府仍掌握重大政策的最後決定權，選舉制度受限於「鳥籠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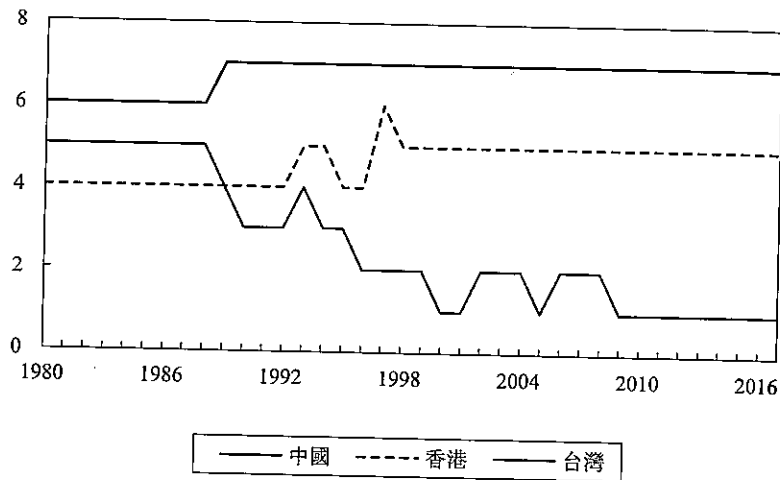
1. 「國際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 與「滾雪球效應」 (snowball effect) 皆強調民主制度的擴散效果，關注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之間的制度學習，透過制度同型化使得舊政體領導者願意放棄或分享既有政治權力來換取更多政經利益，而促成民主轉型 (Huntington, 1991)。

而被視為特殊的威權體制 (Fong, 2017)；在經濟關係上，中國大陸市場與台、港主要產業的聯結相當緊密，2017 年，中國市場佔兩地總出口的 40% 至 50% 左右。² 在經濟密切連結下，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對台、港兩地的經濟狀況有相當大的影響，例如，為台灣特定群體或產業所訂定的「惠台政策」與《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對香港則是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CEPA)。然而，台灣與中國大陸積極進行經貿整合的同時，卻在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太陽花運動」 (或稱「318 學運」)，有效阻止立法院審議 ECFA 貿易協議中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同年 9 月 28 日，香港也發生「雨傘革命」表達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的不滿，與加快普選權落實的訴求 (林楠森, 2014; 鄒頌華, 2014)。

中國大陸政府對台港民眾的政經行為影響甚巨。對台灣民眾而言，即使實質上不隸屬於中共統治，但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與兩岸往來，卻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台灣民眾生活，形成台灣民眾對政體評價的主要資訊來源之一。當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與美國的民主，也可能是民眾比較的對象，然而，美日對台並不聲稱擁有主權；在歷史與政治因素影響下，香港歷經英國長達百餘年的統治，卻始終只得到部分選舉權，回歸中國之後政治改革步伐緩慢，部分學者或機構甚至認為香港民眾的政治權利出現倒退 (見圖 1)。與民主轉型研究脈絡相似，香港民眾面對新舊政體移轉，則是從競爭式威權體制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轉變為霸權式威權體制 (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 (Diamond, 2002; Levitsky and

2. 台灣對中國大陸 (含香港) 出口總額，請參考中華民國行政院 (2018)；香港對中國大陸出口總額，請參考香港貿易發展局 (2018)。

圖 1：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自由之家政治權利指數，1980-2017



資料來源：Freedom House (2018)。

注：2.5 分以下為民主體制。

Way, 2002; Fong, 2017)。擁有主權的中國大陸更是屬於完全封閉的黨國威權體制 (Diamond, 1999)。是此，本文嘗試將體制競爭從新舊體制轉換的對照範疇，延伸至個人對另一聲稱主權的實存政體之比較。在此，我們提出兩個不同的觀察途徑：首先，不同政體對同一群民眾的政策所可能導致體制競爭效果，是否會影響民眾對雙方政體評價的差距，特別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體差異甚大，台灣民眾究竟會如何看待兩個競爭體制？第二，體制競爭的研究關注後共產國家民主轉型時，民眾對新舊政體態度的變化，卻很少關注相對自由的政體轉成威權政體效果如何。對香港民眾來說，這兩種政體競爭同時存在，一方面是回歸之後的本土政治威權化，另一方面的對照是中國大陸的政體績效，港人又是如何看待？

本研究將以個人層次的「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 中國效應」作為自變項，來檢視台港民眾對競爭政體的態度變化。本文將分為六個部分，除引言外。第二部分在回顧相關文獻後，將以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 / 中國效應，來說明台港民眾政體評價差距與政體偏好的來源；第三部分說明體制競爭的測量方式，主要以「政體評價」作為測量指標；第四部分呈現台港民眾政體評價概況，以及自變項設定與本文研究假設；第五部分則是透過統計模型來檢證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 / 中國效應的效果；第六部分為本文結論並討論未來可能研究方向。

解釋體制競爭：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

體制競爭觀點來自 1990 年代後共產國家民主轉型過程的研究，如捷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烏克蘭等，指出民眾廣泛支持是民主鞏固的重要因素 (Linz and Stepan, 1996; Rose et al., 1998:91-92; Diamond, 1999)。Rose 和 Shin (2001) 認為新興國家政體轉型有三種發展路徑，分別為完全民主化、退回部分民主的選舉威權政體，或是陷入非民主的低度均衡陷阱 (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低度均衡陷阱是新興國家遭遇到的最大挑戰，在政治轉型過程中同時要維持民眾的支持，也必須要符合民眾對執政效益的期待，當政體無法有效回應人民的需求時，將會快速減弱民眾對民主體制的支持與期待。以俄羅斯為例，在 1998 年的調查資料中發現，若民眾認為新政體績效無法達到現代國家的標準時，民眾會傾向擁護效率更高的非民主政體，表示當民眾無法獲得預期利益時，可能會偏好前威權政體。本研究主要從兩個影響因素：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來說明政體競爭情況下，影響政體評價與政體偏好的政治社會學機制。政治社會化包括家庭社會化、教育社會化、政黨認同與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以及參與其他政治次團體等，都可能中介影響政體評價，特別是政體移轉過程中，群體利

益與身分認同的分化，將會影響個人政體評價與偏好；制度績效論則是認為經濟績效或政治績效會影響政體評價或偏好。本研究透過這兩個因素，嘗試建構有效的台港民眾體制競爭的理論解釋框架。

政治社會化：政黨認同、國家認同與個人經驗

政治社會化研究包括家庭社會化、教育社會化與一般團體的社會化等 (Jennings, 2007)。家庭社會化，即個人政治價值與信念來自家庭社會化歷程 (Almond and Verba, 1963; Easton, 1965)；教育社會化，主要討論教育對政治價值與信念的影響。Dalton (1999) 指出政治次團體 (subgroups) 如族群、工會與公民結社，是影響個人政治態度的重要因素，由於人們的情感與政治行為很容易被「重要他人」影響，這種以社會化傳遞政治行為的方式，可以是理性或感性的、無意識地模仿父母師長，或是受到鉅觀社會制度影響而產生結構性的態度差異。本研究關注體制轉換造成利益分配的變化，例如社會階層、經濟利益團體或是政治權力的分配。Lipset (1960) 觀察 1945 年西歐國家政體變化，發現民主轉型國家產生許多政治分歧，如高等教育擴張、中產階級與工會發展，以及多元的政治利益團體，而這些分歧可能會因為利益的重分配，而給予新舊政體不一致的評價。

Rose 等 (1998:133-38) 認為有三種類型的傳統團體，可能會影響民眾對體制的支持，第一種為「城市與鄉村」，因為城市與鄉村民眾對政策的需求不一樣，在經濟運作上，城市會希望政府盡可能減少管束以維持充分的競爭，而鄉村則是期望政府有更多的政策配套來保障他們的收入；「宗教」的分歧，來自於教義是否具有排他性所產生的衝突，以及政治權力的正當性是否來自宗教的認可 (Huntington, 1997)；蘇聯瓦解後，中東歐共產國家各自獨立與政體轉型，在此之中許多新興國家建立，這使得國家認同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也包含政黨認同的

差異，當舊政體的政黨延續至新政體運作時，民眾的政黨認同也影響着政體評價。對台灣民眾而言，族群與政黨認同是歷史制度的建構物，既包含社會不平等的理性計算因素，也是家庭社會化影響程度最大的社會分歧來源，這將影響民眾的政治支持、政治信任與投票行為 (吳乃德, 1997; 王甫昌, 2003; 林宗弘、曾惠君, 2014)，這些因素似乎也影響着香港民眾 (王家英、尹寶珊, 2008; 蕭新煌、尹寶珊, 2013)。

除了政治次團體的影響，個人的生活經驗也是重要的政治社會化來源，社會化研究表示個人的政治行為長期受到初級 (primary) 團體亦即家庭的影響，脫離家庭之後，則會以自身生活經驗來調適自身的態度與行為 (Rose et al., 1998; Mishler and Rose, 2007)。生活經驗包括不同世代之間的政體經驗差異，並塑造出世代間的政體評價差距 (林宗弘, 2017)。是此，本研究也延伸出一個新的觀點，在經濟全球化影響下，個人生活經驗並不局限於一國之中，可能會因為就業或就學等因素而必須到其他國家短暫生活，這種跨國經歷是否影響個人的政體評價與偏好？以台港民眾為例，近年來兩地與中國大陸經濟往來密切，勢必使得兩地民眾有更多機會到中國大陸就學、就業甚至是成家，在其他政體的生活經驗，是否會減少台港兩地民眾對中國大陸政體評價的差距，甚至改變政體偏好？

制度績效：政府評價與中國效應

制度績效理論認為，民眾對政體的支持，部分來自其對政治系統輸出與輸入的表現與評價 (Rogowski, 1974)，屬於一種民眾對政體的「工具性」(instrumental) 價值。從政治轉型來看，Diamond (2008) 認為民主精神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的追尋，反映新興民主國家民眾期望能夠在民主體制中，獲得經濟發展與優良法治的「預期效果」。工具性的分析途徑分為兩個部分：政治程序 (political procedure) 與正確估計 (correctness account)，前者關注政治決策的過程，並獨立於所能達成政策

評估，關注過程的規範性，而非產出的預期效用；後者則是關注從政治體制中是否能得到最佳的結果 (Arneson, 2003; Griffin, 2003)。Bratton 和 Mattes (2001) 發現非洲新興民主國家 (如南非、贊比亞與加納) 的政府績效，跟民主滿意程度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顯示非洲國家正以績效驅動 (performance-driven) 來滿足選民需求作為民主支持來源，經濟績效包含個人對自身與整體經濟評估、未來經濟評價，以及經濟改革等面向，對政體評價有顯著的解釋力；政治績效則是政治信任、回應性、貪腐程度與政治財 (如公民自由、投票權或平等待遇) 的提供；在跨國比較中，經濟與政治績效的影響力並不一致。對台港民眾來說，在兩岸三地緊密的經濟關係下，讓中國大陸威權體制得以展現經濟績效，民眾在對照績效差異之後，更可能質疑台灣的民主政體 (陳陸輝、陳奕伶, 2014)。對香港民眾來說，威權政體是否更具吸引力？本研究結合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觀點，來解釋台港民眾的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政治社會化說明台港民眾對中國大陸的複雜情結包含族群認同與利益權衡，而這些因素可能會對台港民眾帶來不同的中介效果；制度績效比較觀點下的中國效應，則是測量體制競爭的效果。

測量體制競爭：政體評價與政體評價差距

Almond 和 Verba (1963) 認為，政治態度是一國民眾對政治體制的認知、情感與評價所形成的集體心理態度，延伸至政體競爭分析，則是關注個人在面臨不同政體轉換時，對新舊政治體制的情感與評價的移轉過程 (iterative process)，在此過程中，新興民主政體必須獲得民眾廣泛支持，才能促使民主體制走向鞏固 (Rose et al., 1998)。然而，經驗研究上的關鍵問題，是個人對體制的評價如何測量？哪些因素影響政體評價與評價的差距？本節主要回顧相關體制競爭測量文獻，並梳理台港體制競爭的歷史脈絡。

民眾的政體評價的測量來源

在行之有年的跨國調查問卷影響下，觀察競爭政體往往採用現成的理論與相關問卷指標，包括政治支持、民主滿意度，與民主的不可替代性 (endorsement of undemocratic alternatives)。首先，Easton (1965) 以政治支持理論區分政治社群、政體，與執政當局三類政治機構，詢問受訪者的支持度，來比較新舊體制的評價差異。Mishler 和 Rose (2007) 以蘇聯瓦解後的俄羅斯為例，在比較這三類政治對象之後發現，經歷政體轉型的俄羅斯民眾，隨着生命歷程發展而產生顯著的新舊政體評價差異，呈現穩定的政治社會化效果。

其次，民主滿意度的測量雖然常見，卻遭遇許多測量效度的挑戰，其不但與現任政府、特定政治機構，或是領導人的表現評價重疊，而且在跨國比較研究上也缺乏一致性 (Dalton, 1999; Klingemann, 1999)。因此，Evans 和 Whitefield (1995) 採用對照題組，來評估民眾對民主制度的渴求度，而 Norris (2011) 將兩個面向合併成為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 題組，藉此測量民眾對民主評價與表現的差距，若是民主評價高於民主滿意度，則會產生赤字，這表示民眾對現行民主體制表示較高的評價，但對表現感到不滿，這類民眾更有可能成為批判性公民 (critical citizens)。³

3. 渴求度通常會分為兩個題組進行對照：第一部分為民主評價：你對國內引進民主的看法如何？如政府的政黨競爭。第二部分是民主滿意度：到目前為止你對當前民主的評價如何？Norris (2011) 則是測量民主價值：生活在民主國家內對你有多重要？以及民主績效：你認為我國當前的民主表現如何？兩個題組為 1 至 10 分，民主赤字是民主價值減去民主績效的 ± 9 尺度。題組原文和詳細內容，請參考 2005 至 2009 年的世界價值觀調查 (World Values Survey)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DocumentationWV5.jsp>)。

最後，民主的不可替代性同時反映權變 (contingent) 與絕對 (absolute) 兩種體制偏好，權變性的體制偏好者會受到績效表現影響，當執政績效不符合期待時，此類型民眾可能會轉向支持其他競爭政體，絕對的體制偏好者則是堅持民主或威權信念，不受體制績效左右 (Rose et al., 1998:101-03)。

上述文獻討論大致說明競爭政體研究的測量方式，但仍有不足之處，如 Rose 等 (1998) 所說，由於個人對政體的評價是不斷重整 (reformable) 的過程。是此，本研究將政體評價的測量方式進行整合，採用對照題組觀察對兩個實存政體的評價差異，內容為：「整體來說，請問您對台灣民主政治的評價好不好？」；「請問您對中國大陸民主政治的評價好不好？」；「請問您對香港民主政治的評價好不好？」⁴ 雖然此題組以「民主政治」作為政體評價來源，但所指涉的對象為「政體」之間的比較，這與 Easton (1965) 將評價對象分類再比較的做法相似，讓受訪者明確針對不同實存政體進行評價。⁵ 同時，我們也將政體評價設為連續變項，兩兩相減來觀察台港民眾政體評價差距。以台灣民眾為例，民眾認為台灣民主政治優於中國大陸，則相減後為正值；與中國大陸民主政治評價差距為零，則代表兩個政體評價一致；若差距呈現負數，則表示認為中國大陸民主政治表現較好；對香港的分析亦然。

4. 台港問卷中皆有相互測量民主評價的題組，但可惜的是題組中缺乏其他相互評價的題目（如香港民眾對台灣政府的表現評價，或是台灣民眾對香港政府的表現評價），因此，本研究對政體的比較着重在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政體評價比較。
5. 再者，即使是非民主國家也宣稱體制的運作代表民眾，表示民主的詞彙逐漸成為政體的規範性意義，近年的跨國調查也發現不同政體的民眾，都能普遍的對民主表達正向態度 (Norris, 2011)。

台港民眾政體競爭的政治社會化基礎

政體競爭如何用來說明中國大陸對台港民眾自身的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的影響？對新興民主政體如台灣的民眾而言，民主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透過長期的體制變革造成，現實裏，民主體制並非唯一選項，即使台灣經歷二次政黨輪替，或多或少有民眾緬懷過往的威權遺緒 (authoritarian nostalgia) (Rose et al., 1998; 吳重禮, 2008; 黃信豪, 2011)。⁶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民眾如何看待中國大陸的黨國威權體制？特別在中國大陸快速經濟發展與國力增強的「大國崛起」脈絡下，這種「中國效應」對台灣民眾的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帶來什麼作用？

台灣的中國效應分析文獻已有類似研究。陳陸輝等 (2009) 從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的角度，分析台灣民眾對開放兩岸經貿的政策立場，發現民眾對開放兩岸經濟政策的評估，受到自身的政治認同影響，他們認為民眾受到感性認同因素的影響，使得統獨議題涵蓋兩岸經貿關係，無法用單純經濟利益來衡量。個人的政黨、族群與國家認同，是影響台灣民眾評估中國大陸效益的中介變項，限縮了中國效應的影響。林宗弘、胡克威 (2011) 認為，台灣各階層民眾對兩岸經濟利益分配認知有所差異，進而影響自身的投票傾向，資方與中產管理階層認為兩岸經濟有利於台灣整體經濟者傾向支持國民黨，相對的工農與中下階層則傾向支持民進黨，他們認為若貿易利益集中在少數產業，將會分化台灣的階級政治，甚至改變政治版圖。陳陸輝、陳奕伶 (2014) 觀察兩岸關係對台灣民眾總統滿意度與政體偏好傾向的影響，在 2010 年的調查發現：預期在兩岸經貿關係得

6. 威權遺緒來自歷經威權轉型的民眾對民主政體績效的不滿，而緬懷過往威權時期的經濟成長與穩定秩序，這種情感大多出現在新興民主國家 (Huntington, 1991)。

利的民眾，對馬英九總統有較高的滿意度，但無法得知政黨認同對兩岸關係評價的影響。在政體偏好方面，他們發現，當受訪者認為兩岸交流有助於台灣經濟發展時，愈傾向認為兩種體制無差別，但統計差異未達顯著水平，而當受訪者認為戰爭風險愈大時，則愈傾向認為民主體制比較好。這些研究發現，中國效應在兩岸經濟政策態度、投票行為，以及政體偏好上有相當程度影響，也帶出重要的現實問題：當中國大陸持續加碼經濟利誘，是否會影響台灣民眾對民主體制的堅持？

另一方面，近年來香港轉向更為封閉的威權政體，民眾對政體的評價與評價差距有何改變？王家英、尹寶珊（2008）在調查資料中發現，香港民眾的身分認同，與對香港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意見，以及對自由民主政治態度的關係非常密切，由於香港的中國大陸出生人口佔香港總人口的比例約為 30% 上下，⁷ 使得身分認同因素造成香港民眾在各政治態度面向上產生差距；林宗弘（2014）指出，政治體制是否已經完成轉型，將會影響民眾身分認同的本土化程度、政體評價與政體偏好。以香港為例，在尚未完成政治轉型之際，香港民眾必須面對既有體制所產生的政治不確定性，以及兩地政經整合而導致的身分認同衝突，如自由行的中國大陸觀光客所帶來的文化衝擊、「雙非」（父母雙方皆非香港居民）新生兒擠佔本地香港人的醫療資源，以及觀光客透過倒賣奶粉牟利等，這將會引發香港民眾對新政體不信任感，而產生反威權體制的態度。其在經驗資料中也發現，若是出生地為中國大陸的香港民眾，會傾向自認是中國人，並對現任親中政府與香港民主的評價偏高；反之，出生地為香港的民眾，則傾向自認是香港人，不支持「一國兩制」，而對

7. 根據香港 2006、2011 和 2016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中國大陸（含澳門和台灣）出生人口佔香港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 33.5%、32.1% 和 31.0%（香港政府統計處，2017）。

現任親中政府與香港民主的評價偏低。相較之下，台灣在民主轉型後政治不確定性減弱，民眾身分認同變得更為本土化，族群政治衝突減緩，民眾給予民主體制較高評價。該文認為，台港民眾對民主評價的差異，在於台灣民眾已經歷過不同政體轉換，香港民眾則陷入身分衝突，民主評價難以提升。

上述研究確實已經觸及「政體競爭」概念，卻未詳盡論述，使得政體競爭研究留下許多空白，本研究透過台港民眾作為新案例，詳細分析政治社會化與經濟績效比較的影響，期望對政體競爭研究提供新意。

資料來源與變項設定

本文研究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的合作計劃，由張茂桂與尹寶珊主持，在台港兩地同時進行 2013 與 2016 年「中國效應研究」電話調查。在合作過程中，台港學者有共識地設計類似的問題，這份數據給我們寶貴且獨特的機會，可以比較台港兩地中國效應對政體評價所造成的效果。此調查採用電話隨機抽樣訪問，電話接通後再以隨機的方式選取符合調查資格的家庭成員作為訪談對象。台灣訪問成功的樣本分別為 1,243 人與 1,226 人（母體約為 1,936 萬人），香港訪問成功的樣本則為 1,006 人與 1,004 人（母體約為 600 萬人）。⁸

台港民眾體制態度概況：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

本文在第二部分已大致討論了政體競爭的兩個指標「政體評價」和「評價差距」的測量，分別代表台港民眾對當前政體

8. 相關樣本代表性檢定與母體概況請參考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https://srda.sinica.edu.tw/>)，以及香港政府統計處（2017），香港的統計資料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的即時性評價與比較，也讓我們了解體制競爭的比較脈絡。以下將說明台港民眾的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的概況，但在資料使用與解釋上仍必須注意一些前提，由於台港調查計劃由兩個不同單位執行，即使問卷題組內容一致，我們仍必須注意測量尺度差異，與無反應受訪者的歸類和比例，以本研究關注的民主政治評價題組為例，台灣受訪者回答其他/沒意見的比例較低，而香港則是有比較高的比例回答其他/沒意見（表1），因此，我們必須依台港兩項調查的回應分布情況，進行分析尺度的調整，在民主政治評價的部分，台灣是1至4分的尺度，香港則是-2至+2分的尺度，但是這樣的調整並不會影響模型整體的解釋方向，同時也能避免調查樣本的過度流失。⁹

我們發現兩波資料中，台灣民眾給予自身政體正向評價的比例為五至六成，負向評價的比例為三至四成左右，對中國大陸政體持正向評價的比例不足兩成，負向評價的比例則為八成左右，同時發現2016年對中國大陸的負向評價有增加的趨勢；香港民眾給予自身政體正向評價的比例從三成五下降至兩成二，負向評價則從五成三增加至六成七，對中國大陸政體持正向評價從約一成增加至一成六，負面評價則從八成下降至七成二。這樣的差異顯示，台灣民眾對自身的民主政治評價較高，香港則是呈現對自身與中國大陸評價皆偏低的情況；而在跨年度的觀察則發現，台灣對自身正向評價增長，對中國大陸正向

9. 台灣在執行電話訪問的過程中，若是受訪者表示「其他」、「不關心」、「沒意見」、「不知道」，以及「不了解題意」，將會深入「追問」，透過重述受訪者意見與說明題意，儘量減少受訪者不表態的情況（約1-5%）。香港的電話訪問則是在採取追問之後，仍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表示沒意見（約10%）。雖然依變項會呈現兩種不同樣貌的連續變數（1-4分與-2-+2分），但本研究並不是總和台港民眾的 Pooled Regression Model，因而不會影響模型設定與研究問題。

表1：台港民眾的民主政治評價（%）

		很好	好	沒意見	不好	很不好	(N)
台灣民眾評價							
台灣	2013	17.9	39.4	1.2	22.0	19.6	(1243)
	2016	22.0	40.1	1.1	19.9	16.9	(1226)
中國大陸	2013	2.1	16.1	5.2	37.2	39.4	(1243)
	2016	2.2	11.9	5.3	29.7	50.9	(1226)
香港民眾評價							
香港	2013	2.4	32.7	11.6	42.1	11.3	(1003)
	2016	1.2	20.3	11.6	48.1	18.8	(1004)
中國大陸	2013	0.6	8.4	11.0	42.1	38.0	(1004)
	2016	1.2	14.4	12.8	36.0	35.7	(1004)

評價則是減低的趨勢；香港則是對自身正向評價減弱，而對中國大陸正向評價出現略微增長的情況（表1）。總體來看，相當符合我們認知的台港現狀，但是這樣的政體評價觀察缺乏對照，也無法有效帶入體制競爭的概念。

接下來，我們分別將兩組評價進行相減（台灣-中國大陸、香港-中國大陸），來觀察台港民眾對自身與中國大陸政體評價的差距。我們發現兩波調查資料中，台灣民眾認為自身政體比中國大陸好的比例各為五成九與六成六，差距為零的比例為兩成七與兩成半，認為比中國大陸差的比例皆為一成左右；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正向評價差距則是從五成六下降至四成，差距為零的比例則是從三成六上升至四成三，認為比中國大陸差的比例由近一成上升至一成八（表2）。

台灣民眾在評價差的部分與表1的結果相似，但可以發現約四分之一的民眾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政體差不多，同時也有約一成的民眾認為台灣比中國大陸差；香港則是有三至四成的

表 2：台港民眾的政體評價差距 (%)

評價差距		1-4 分	0 分	-1--4 分	(N)
台灣 - 中國大陸	2013	58.6	27.1	14.2	(1172)
	2016	65.5	24.7	9.8	(1156)
香港 - 中國大陸	2013	56.4	35.6	8.0	(1002)
	2016	39.3	42.6	18.0	(1004)

民眾認為香港與中國大陸政體差不多，而在 2016 年的調查中，對自身政體評價較高者跌至四成以下。換言之，台灣民眾有較高的比例對自身的政體評價較高，而且比例也較為穩定；香港則有約四成的比例認為兩個政體沒有差距，甚至出現傾向中國大陸體制比較好的發展趨勢。透過評價差距的觀察，似乎更能捕捉民眾對政體態度的差異，以及反映體制競爭的概念。總的來說，台灣民眾呈現相當比例的民主政體偏好態度，香港民眾則是呈現相當分歧的支持傾向，而促成這樣現象的原因為何？後續我們將會深入討論之。

自變項的設定與研究假設

在第三部分，我們已經說明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是個人政治態度的重要解釋框架，然而，如何說明政治社會化形塑個人的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的過程？首先在年齡與教育程度的部分，年齡被視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來源，由於年齡同時包含了個人社會化、生命歷程、生活經驗等因素，若是世代間有不同政體的轉換經驗，可能會對政體產生不一致的評價，而在政體偏好上可能會產生分歧。Mishler 和 Rose (2007) 的研究也強調年齡的效果，並發現兩個不同的影響路徑，經歷不同政體的民眾，隨着生活經驗的增長，對新政體的評價將會提升；另一方面則是世代間的政體評價會有所差異，年紀較輕者對新政

體有較高的評價（假設 1a）。同時，教育程度也是重要的解釋因素，教育程度愈高的民眾，愈能給予政體公允的評價，以及愈能了解政體運作的差異（假設 1b）。另外兩項重要的政治社會化來源是身分認同與政黨傾向，在台港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歷史發展脈絡下，身分認同一直是影響台港民眾政治態度的重要因素，當政體範圍與個人身分認同一致時，民眾會給予正向的評價；但若是兩者範圍不一致時，甚至影響範圍的重疊，可能會產生負面的評價與支持態度。這同時也連接着政黨傾向因素，台港的政黨反映了與中國大陸友好與對抗的關係，這也會連帶強化所屬民眾對政體的正負面評價（假設 1c）。再者，我們考慮了個人經驗的效果，由於各人的生活經驗並不局限於單一政體範圍之內，透過不同政體經驗的累積，可能會改變個人既有的政體評價與支持傾向（假設 1d）。

制度績效的設定，我們也納入了政府評價作為控制變項，在 Easton (1965) 對政治機構的定義中，「政府」是最具體的評價對象，但是政府的表現往往包含在政體績效之中，為了有效測量，我們將台港與中國大陸的政府評價放入模型中作為觀察變項（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與中國大陸），¹⁰ 因此，政府表現的評價愈正面，可能會使得民眾對政體的評價愈正向（假設 2a）。另外是放入了民眾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預期，在體制競爭的假設下，若是民眾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預期愈正向，愈可能會減少對中國大陸政體的評價差距（假設 2b）。再者，我們也將中國大陸經濟政策所可能衍生的政治效果納入考量，

10. 政府評價的題組為：「整體來說，請問您對台灣政府的評價好不好？」；「請問您對中國大陸政府的評價好不好？」；「請問您對香港特區政府的評價好不好？」我們同樣針對受訪者回應的分布情況進行尺度調整，在此，我們將政府評價設定為 -2 至 +2 的五分尺度。

分別為：「請問您認為兩岸經濟關係愈來愈密切，這樣會擴大或是縮小台灣／香港的貧富差距？」以及「請問您認為兩岸經濟關係愈來愈密切，那麼台灣／香港在政治上要維持現狀／要維護『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會變得比較容易，還是比較困難？」這兩題為了方便解讀，我們採用負向編碼，就是當民眾對經濟所衍生的政治效果抱持負面的態度，則分數會愈高。在此，我們假設當民眾認為自身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所衍生的政治效果評價愈負面，可能會增加政體評價的差距，民眾則愈不傾向非民主體制的支持態度（假設 2c）。

模型結果與比較分析

本節為政體競爭模型的比較與分析，以下將以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所建構的比較框架，來解釋影響台港民眾政體評價差距的來源，另外，也以政體評價差距作為對照，期望透過對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的觀察，可以有效的建構台港民眾體制競爭的解釋路徑。

政體評價的差距來源：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

首先，簡單說明自變項的設定（附表 1）。在年齡的部分，我們以十歲作為間距分成五等分，並以「60 歲及以上」作為參照組，來觀察年齡層之間是否有政體評價上的差異。在教育程度的部分，我們根據台港不同的學制，將教育程度分為高、中、低三類，並以教育程度低作為參照組。在收入的部分，雖然台港調查採用不同問題，但個人收入與家庭收入在廣義的概念上差異較小，都是說明個人的社會經濟程度，因此，我們並沒有將收入題組捨棄，遺漏值設為中位數。台灣在政黨傾向分類的爭議較小，大致可分為泛藍、泛綠與中立；香港的政黨傾向分類則有些爭議，由於香港政黨眾多，難以簡單的二分為民主派或建制派，本文採取的分析策略是先將建制派、無政黨傾向的

民眾分類出來，再將剩下的政黨歸類為非建制派，一來減少樣本數的流失，二來是將非親中態度的政黨視為對照對象。身分認同分類的爭議比較小，我們將其分為台灣／香港人認同、中國人認同，和雙重認同。

其次，說明台灣民眾政體評價與政體評價差距的政治社會化因素（表 3）。在台灣，先就各政體評價模型來看，年齡在台灣（a）與中國大陸（b）模型的效果皆不顯著，這表示假設 1a 並未成立。但可以發現，在評價差距模型（a-b）中，年齡大部分呈現正向的分數，而 29 歲及以下相較於 60 歲及以上的民眾，在評價差距模型卻呈現負向關係，就我們進一步觀察發現，29 歲及以下民眾的評價在中國大陸模型中的係數很小（0.01），因此，29 歲及以下民眾的評價差距減少，並不完全是受到中國大陸正向評價的影響，主要原因應該還是來自對自身政體評價的不滿。教育程度的部分在評價差距的模型（a-b）中，相較於教育程度低的民眾，教育程度愈高則政體評價差距愈大（假設 1b），中、高教育程度的分數為 0.26 和 0.54，進一步檢視教育程度高的民眾在不同模型的效果，則可以發現他們對台灣（a）有較正向的評價（0.19），對中國大陸（b）則是較負向的評價（-0.36），顯示教育程度是評價差距的重要來源。從個人的每月平均收入也可以觀察到，收入愈高則正向評價差距增加的情況。這部分與現代化理論的解釋相當一致，也就是說當個人的社會經濟條件提高，將會影響自身對政治知識的理解，並能給予民主政體正面的評價。

接下來說明政黨傾向、身分認同與個人經驗的部分。在評價差距的模型中可以發現，台灣民眾的政黨傾向與身分認同皆有相當程度的解釋力，這與先前的研究相當一致，但是在台灣、中國大陸個別模型中卻有不同的解釋路徑。在政黨傾向屬於泛藍的民眾，往往被視為具有親中態度的群體，因此可以發現泛藍民眾相較於中立政黨傾向的民眾有較小的評價差距，在台灣

表 3：台灣民眾的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2013 和 2016

	台灣 - 中國大陸 (a-b)		台灣 (a)		中國大陸 (b)	
	β	s.e.	β	s.e.	β	s.e.
性別 (女性)	0.05	0.05	-0.01	0.04	-0.06	0.03*
年齡 (60 歲及以上)						
29 歲及以下	-0.09	0.10	-0.07	0.08	0.01	0.06
30-39 歲	0.06	0.09	0.04	0.07	-0.02	0.05
40-49 歲	0.05	0.08	-0.01	0.07	-0.06	0.05
50-59 歲	0.01	0.08	-0.04	0.06	-0.06	0.05
教育程度 (低)						
中	0.26	0.07***	0.07	0.06	-0.19	0.05***
高	0.54	0.09***	0.19	0.07**	-0.36	0.05***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	0.03	0.01**	0.01	0.01 ⁺	-0.01	0.01*
政黨傾向 (中立)						
泛藍	-0.18	0.06**	-0.18	0.05***	0.00	0.04
泛綠	0.29	0.06***	0.21	0.05***	-0.08	0.04*
身分認同 (台灣人)						
雙重認同	-0.27	0.07***	-0.27	0.06***	0.00	0.04
中國人	-0.39	0.09***	-0.30	0.07***	0.08	0.05
個人經驗						
來往中國經驗	-0.07	0.03*	-0.07	0.02**	0.00	0.02
改善家庭經濟	0.08	0.03**	0.09	0.02***	0.01	0.02
制度績效/中國效應						
台灣政府評價	0.17	0.02***	0.22	0.02***	0.04	0.01***
中國大陸政府評價	-0.26	0.02***	-0.05	0.02**	0.21	0.01***
經濟持續發展	-0.09	0.02***	-0.03	0.02*	0.06	0.01***
貧富差距增加	0.09	0.02***	0.05	0.02**	-0.04	0.01**
無法維持現狀	-0.01	0.02	-0.02	0.02	-0.01	0.01
年度 (2013)	0.07	0.05	-0.04	0.04	-0.11	0.03***
常數	0.33	0.10***	2.63	0.08***	2.30	0.06***
Adjusted R ²	0.20		0.12		0.25	
F 值	29.02		16.00		37.79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樣本數為 2,259。括號內為參照組。

模型 (a) 中也有較負向的評價 (-0.18)，但是我們在中國大陸模型 (b) 中發現影響的係數卻很小 (也不顯著)，這表示減少泛藍民眾評價差距的主要來源，是對台灣民主的評價；相對的，泛綠民眾則是在台灣 (a) 與中國大陸 (b) 政體評價模型中呈現對立的態度，而使得評價差距較大 (假設 1c)。身分認同的部分 (a-b) 是雙重認同和中國人認同相較於台灣人認同，均有較小的評價差距 (-0.27 和 -0.39)，兩者在台灣模型 (a) 中也有負向的影響，但是身分認同因素卻沒有在中國大陸模型 (b) 中呈現正向評價 (不顯著且係數小)，這表示身分認同主要是衡量台灣評價的因素，雖然影響着政體評價差距，但並不是因為台灣民眾對現存中國大陸政權的認同，而更可能是台灣民眾對本土化身分認同的移轉過程 (假設 1c)。在去年來往中國大陸的經驗可以發現減少評價差距的效果 (假設 1d)，對台灣模型 (a) 則出現負向影響 (-0.07)，可能是這些具有中國經驗的民眾調整了政體評價的標準，使得評價差距減少並表示對自身政體的不滿，同樣也可以發現，台灣民眾沒有因為有較多的中國大陸生活經驗，而對中國大陸 (b) 有較高的評價。因為兩岸經濟關係而改善自身家庭經濟的狀況，在評價差距 (a-b) 與台灣 (a) 模型中皆呈現正向效果 (假設 1d)，這可能是台灣民眾將其視為國內的兩岸政策的效果，而不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讓利。

最後是說明制度績效/中國效應對台灣政體評價差距 (a-b) 的影響。平均來說，台灣民眾對台灣政府評價每增加 1 分，評價差距會增加 0.17 分，並達統計顯著效果；對中國大陸政府評價愈高，則顯著的減少評價差距，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府的評價每增加 1 分，評價差距會減少 0.26 分 (假設 2a)。然而，我們進一步檢視台灣與中國大陸模型，可以發現特殊的現象。在中國大陸模型 (b) 中，台灣民眾對台灣政府評價每增加 1 分，對中國大陸政體評價也會增加 0.04 分，這可能是兩岸

關係呈現穩定狀態時，台灣民眾也給予中國大陸正向的評價。台灣民眾認為中國大陸經濟將會持續發展，將會減少評價的差距（假設 2b），在台灣模型（a）產生負向的效果（-0.03），而在中國大陸模型（b）則是正向的效果（0.06），這表示不同政體所展現的經濟績效，確實會影響台灣民眾對自身政體評價的標準。兩岸經濟發展所衍生的政治效果，也同樣會改變評價差距，以兩岸經濟關係是否會擴大或是縮小台灣內部的貧富差距的看法來測量，結果發現，當台灣民眾認為兩岸經濟關係密切會擴大台灣內部貧富差距，評價差距會增加 0.09 分（假設 2c），在台灣模型（a）中有正向的效果（0.05），在中國大陸模型（b）則是負向的效果（-0.04）。

從香港民眾的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可以發現年齡的效果（表 4）。在評價差距模型（c-d）中，除 50-59 歲民眾外，其他年齡層相較於 60 歲及以上的民眾，均有較大的評價差距，而且年齡層愈低的差距分數愈大，29 歲及以下、30-39 歲和 40-49 歲的差距各為 0.28 分、0.21 分和 0.18 分。在中國大陸模型（d）中，年齡也有較高的負向效果，表示在政體的移轉過程中加深了世代之間的不滿，年輕世代也沒有表現出較為接受新政體的態度（不符合假設 1a）。教育程度可以反映教育程度高的香港民眾，同時對自身政體與中國大陸政體不滿（-0.28 和 -0.13），最後導致評價差距減少（假設 1b），也就是說，對教育程度高的民眾而言，「一國兩制」與中國大陸威權體制的差異並不大。在政黨傾向的部分，建制派相較於非建制派的民眾有較小的政體評價差距（-0.52），在香港模型（c）有負向的效果（-0.26），在中國大陸模型（d）則是有正向的效果（0.26），無政黨傾向相較於非建制派的民眾，是有相似的傾向但是影響分數較小，這部分有可能是政黨利益的分歧反映在政體的評價上（假設 1c）。雙重身分和中國人認同同樣有減少評價差距的效果，並對中國大陸模型（d）有正向的效果（0.15 和 0.19），

表 4：香港民眾的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2013 和 2016

	香港 - 中國大陸 (c-d)		香港 (c)		中國大陸 (d)	
	β	s.e.	β	s.e.	β	s.e.
性別 (女性)	-0.06	0.06	-0.06	0.05	-0.01	0.04
年齡 (60 歲及以上)						
29 歲及以下	0.28	0.10**	0.01	0.08	-0.26	0.06***
30-39 歲	0.21	0.10*	0.05	0.09	-0.16	0.07*
40-49 歲	0.18	0.09*	-0.06	0.08	-0.24	0.06***
50-59 歲	0.06	0.08	-0.12	0.07	-0.17	0.05**
教育程度 (低)						
中	0.02	0.07	-0.10	0.06	-0.12	0.05*
高	-0.16	0.08 ⁺	-0.28	0.07***	-0.13	0.06*
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0.02	0.01*	0.00	0.01	-0.02	0.01**
政黨傾向 (非建制派)						
無政黨傾向	-0.20	0.06**	-0.09	0.06	0.11	0.04**
建制派	-0.52	0.09***	-0.26	0.08***	0.26	0.06***
身分認同 (香港人)						
雙重認同	-0.22	0.09*	-0.07	0.08	0.15	0.06**
中國人	-0.21	0.07**	-0.02	0.06	0.19	0.05***
個人經驗						
來往中國經驗	-0.03	0.02*	-0.03	0.01*	0.00	0.01
改善家庭經濟	0.07	0.03*	0.04	0.03	-0.03	0.02
制度績效/中國效應						
香港政府評價	0.12	0.03***	0.18	0.03***	0.07	0.02**
中國大陸政府評價	-0.12	0.03***	0.11	0.03***	0.23	0.02***
經濟持續發展	0.02	0.03	0.07	0.02**	0.05	0.02**
貧富差距增加	0.06	0.03*	-0.02	0.02	-0.08	0.02***
無法維持現狀	0.09	0.03**	-0.07	0.03**	-0.16	0.02***
年度 (2013)	-0.50	0.06***	-0.33	0.05***	0.18	0.04***
常數	0.80	0.12***	0.17	0.11	-0.63	0.08***
Adjusted R ²	0.14		0.16		0.42	
F 值	16.16		18.08		69.28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樣本數為 1,857。括號內為參照組。

在香港模型 (c) 則是沒有顯著影響，這意味着身分認同的移轉，可能有助於新政體獲得正向評價，也就是說，身分認同與新政權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並影響着民眾對新舊政體的評價差距 (假設 1c)。去年來往中國大陸的經驗具有減少評價差距的效果，在香港模型 (c) 則是負向的效果，這部分同樣也是香港民眾對自身政體評價標準的調整結果 (假設 1d)；香港與中國大陸兩地的經濟交流改善自身家庭經濟的狀況，將會擴大評價差距，這可能也是香港民眾將其視為香港內部的經濟政策效果，而非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政策 (不符合假設 1d)。

繼而觀察制度績效 / 中國效應對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的影響。在評價差距的部分，當香港政府評價每增加 1 分，評價差距會增加 0.12 分，而當中國大陸政府評價每增加 1 分，則會減少評價差距 0.12 分，可以發現個別政府表現是評價差距的重要來源。但是，我們同樣也觀察到特殊的現象，在香港模型 (c) 中，香港民眾對中國大陸政府的評價每增加 1 分，香港政體評價會增加 0.11 分，而在中國大陸模型 (d) 中，香港民眾對香港政府評價每增加 1 分，中國大陸政體評價會增加 0.07 分，這表示香港民眾對兩地政府評價有重疊或是相互提升的情況 (假設 2a)。但是，在兩地經濟發展所衍生的政治效果，卻可以發現不同於台灣的現象。在貧富差距增加與無法維持「一國兩制」的情況下，會增加香港與中國大陸政體的評價差距 (0.06 和 0.09)，然而，分別在香港 (c) 與中國大陸 (d) 的模型中，貧富差距與無法維持現狀兩個變項，卻在模型中呈現負向的效果，對中國大陸政體評價更較自身評價低 (如： $0.06 = -0.02 - (-0.08)$ 或 $0.09 = -0.07 - (-0.16)$)。估計香港民眾即使對兩地經濟關係所衍生的政治效果表示不滿，但是卻又能夠勉強接受當前體制的表現 (模型 c-d)。另外，在經濟持續發展的變項中，可以發現對個別政體模型有正向的效果 (0.07 和 0.05)，但是對於評價差距卻沒有顯著的影響，估計香港民眾既期望能從中

中國大陸的政體績效中獲得利益 (卻又不會改變自身評價差距)，而在負向的政經效果下可能會抱持着相當程度的自治態度 (兩害相權取其輕)。也就是說，當香港民眾對中國大陸制度績效有正向評價時，將會分別提升兩地的政體評價 (模型 c 與模型 d)，一旦兩者皆出現負向的評價，則是轉回支持自身的政體 (不符合假設 2b 與 2c)。

總的來說，政治社會化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反映出較為一致的評價差距因素，而政黨傾向、身分認同與個人經驗，則反映出不同的影響脈絡，但同樣對政體評價差距有顯著的影響；從制度績效 / 中國效應，可以觀察到更多的政體競爭的過程，並直接影響着台港民眾對中國大陸政體評價的距離。

政體評價的差距來源：時間脈絡的交互作用

除了上述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因素之外，我們還必須關注時間脈絡的影響，在表 3 的台灣資料可以發現，調查年度在中國大陸模型 (b) 中有顯著差異，2016 年相較於 2013 年的中國大陸政體評價減少 0.11 分，台灣模型 (a) 同樣下降 0.04 分 (但不顯著)。表 4 的香港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模型 (d) 在 2016 年對中國大陸政體評價增加 0.18 分，在香港模型 (c) 是對香港政體評價減少 0.33 分，在評價差距模型 (c-d) 則是差距減少 0.50 分。這樣的結果顯示這兩個調查年度在政體評價上有所轉變，這些轉變對模型的變項又有什麼影響？如引言所說到，在台灣與中國大陸、香港與中國大陸經濟關係積極發展的同時，在 2014 年台灣與香港不約而同的發生大型的反中社會運動，這對政體評價模型又會產生何種變化？

是此，本研究將年度設定成為虛擬變項，並與模型內的變項設定交互作用來進行討論，為了模型的簡約與穩定性，我們僅留下具統計顯著意義的交互作用項。放入交互作用項後比較表 3、4 與表 5、6 的變化，發現控制變項與制度績效變項仍呈現相當穩定的情況，也維持相當程度的解釋力，而在政黨傾向、

身分認同和個人經驗與時間，均有顯著的交互作用，這表示時間可以解釋政治社會化因素的變異。

在台灣，政黨傾向的部分，除了泛綠民眾相較中立民眾在中國大陸模型 (f) 有較低的評價與時間交互作用的效果不顯著之外，其與時間的交互作用皆呈現顯著影響，在評價差距模型 (e-f) 與台灣模型 (e) 皆可以發現，泛藍相較於中立民眾有負向的效果 (-0.45 和 -0.31)，泛綠民眾則是有正向的效果 (0.25 和 0.30)，或許是政黨傾向反映了台灣民眾在兩岸關係上態度的分歧，隨着時間出現明顯的加強。在身分認同的部分，可以發現雙重認同與時間的交互作用，在台灣模型 (e) 與中國大陸模型 (f) 中皆產生負向的效果 (-0.37 和 -0.23)，顯示雙重認同者在 2016 年對這兩個政體較 2013 年不滿，中國人認同與時間的交互項則是在台灣模型中有負向的效果 (-0.28)。去年來往中國經驗與時間的交互作用，在中國大陸模型 (f) 中有正向的效果 (0.09)，但是並沒有影響評價差距，這可能是中國大陸對台政策改變，而提升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體的正向評價，然而，這部分解釋缺乏更多的資料驗證，因此仍有待其他後續研究觀察。改善家庭經濟與時間的交互作用，在評價差距 (e-f) 與台灣模型 (e)，則呈現負向的效果 (-0.11 和 -0.10)，表示因兩岸經濟關係而改善自身家庭經濟狀況者，可能對兩岸經濟政策感到不滿 (表 5)。

在香港，政黨傾向與時間的交互作用，可以發現大致上同樣呈現穩定的狀態，主要的時間效果展現在中國大陸模型 (h) 中的建制派支持者。2016 年相較於 2013 年有較正向的效果 (0.22)，也就是說，建制派相較於非建制派的香港民眾，在 2016 年有較高的中國大陸政體評價，這可能是政黨傾向加大了香港民眾利益分歧的意識。身分認同與時間的交互作用，可以發現在評價差距模型 (g-h) 中，雙重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評價差距減少，而在中國大陸模型 (h) 中，是有正向的效果 (0.25

表 5：台灣民眾的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以時間作為交互作用項

	台灣 - 中國大陸 (e-f)		台灣 (e)		中國大陸 (f)	
	β	s.e.	β	s.e.	β	s.e.
性別 (女性)	0.05	0.05	-0.01	0.04	-0.06	0.03*
年齡 (60 歲及以上)						
29 歲及以下	-0.12	0.10	-0.10	0.08	0.02	0.06
30-39 歲	0.03	0.08	0.02	0.07	-0.01	0.05
40-49 歲	0.03	0.08	-0.03	0.06	-0.06	0.05
50-59 歲	0.00	0.08	-0.05	0.06	-0.05	0.05
教育程度 (低)						
中	0.26	0.07***	0.07	0.06	-0.19	0.05***
高	0.54	0.09***	0.18	0.07**	-0.36	0.05***
個人每月平均收入	0.03	0.01**	0.01	0.01	-0.01	0.01*
政黨傾向 (中立)						
泛藍	0.03	0.08	-0.03	0.07	-0.06	0.05
泛綠	0.13	0.09	0.02	0.08	-0.10	0.06 ⁺
身分認同 (台灣人)						
雙重認同	-0.11	0.12	0.03	0.10	0.14	0.07 ⁺
中國人	-0.28	0.11*	-0.18	0.09*	0.10	0.07
個人經驗						
來往中國經驗	-0.04	0.04	-0.09	0.03*	-0.05	0.03 ⁺
改善家庭經濟	0.14	0.04***	0.15	0.03***	0.01	0.02
制度績效/中國效應						
台灣政府評價	0.16	0.02***	0.21	0.02***	0.05	0.01***
中國大陸政府評價	-0.25	0.02***	-0.04	0.02*	0.21	0.01***
經濟持續發展	-0.09	0.02***	-0.03	0.01 ⁺	0.06	0.01***
貧富差距增加	0.08	0.02***	0.04	0.02*	-0.04	0.01**
無法維持現狀	0.01	0.02	0.00	0.02	-0.01	0.01
年度 (2013)	0.22	0.09*	0.05	0.07	-0.17	0.05**
交互作用項 (* 年度, 2013 = 0)						
泛藍	-0.45	0.12***	-0.31	0.10**	0.15	0.07*
泛綠	0.25	0.12*	0.30	0.10**	0.06	0.08
雙重認同	-0.14	0.15	-0.37	0.12**	-0.23	0.09*
中國人	-0.24	0.17	-0.28	0.14*	-0.05	0.10
來往中國經驗	-0.07	0.06	0.02	0.05	0.09	0.03**
改善家庭經濟	-0.11	0.05*	-0.10	0.04*	0.01	0.03
常數	0.28	0.10**	2.59	0.08***	2.32	0.06***
Adjusted R ²	0.22		0.14		0.25	
F 值	25.07		15.62		29.88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樣本數為 2,259。括號內為參照組。

和 0.21)，顯示新政體主導着政黨傾向與身分認同的效果，並減少香港民眾對兩地政體評價的差距。在時間脈絡下的觀察，可以發現香港民眾的政黨傾向與身分認同，成為影響中國大陸政體評價的重要因素（表 6）。

總的來說，透過時間因素與交互作用項的討論，我們發現政黨傾向與身分認同並不是台港民眾穩定評價政體的因素，而是會隨着其他因素（特殊事件、政策效果）而發生變動，進一步來說，政體競爭可能會隨着時間的發展，而強化個人政黨傾向與身分認同的作用，這可能是來自民眾對本身政體表現的不滿的累積，或是對中國大陸政策所形成利益分歧的抵抗態度。

結論

政體競爭理論關注個人對新舊政體的情感與評價移轉過程，本研究試圖以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的解釋框架，來說明不同政體競爭影響路徑。第一個研究路徑以台灣為例，觀察不同政體對同一群民眾的政策輸出，是否會影響其個人經驗，進而改變民眾對政體的評價與支持態度；第二個研究路徑以香港為例，主要觀察朝威權政體退化的效果。本文使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合作的 2013 與 2016 年「中國效應」電話調查資料作為基礎，期望為政體競爭帶來更多新的研究切入點與經驗價值。

本研究以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作為政體競爭的觀察來源，前者透過不同政體的評價，來捕捉政體競爭的來源；後者則是以評價差距，來說明民眾的政體競爭考量因素。政治社會化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反映出較為一致的評價差距因素，而政黨傾向、身分認同與個人經驗，則反映出不同的脈絡；制度績效/中國效應則可以觀察到更多的政體競爭過程，並直接影響着台港民眾對中國大陸政體評價的距離。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政黨傾向與身分認同在台港資料中顯現出不同的影響脈絡，這部

表 6：香港民眾的政體評價與評價差距：以時間作為交互作用項

	香港 - 中國大陸 (g-h)		香港 (g)		中國大陸 (h)	
	β	s.e.	β	s.e.	β	s.e.
性別 (女性)	-0.06	0.06	-0.06	0.05	0.00	0.04
年齡 (60 歲及以上)						
29 歲及以下	0.26	0.10**	0.01	0.09	-0.24	0.06***
30-39 歲	0.20	0.10*	0.05	0.09	-0.15	0.07*
40-49 歲	0.16	0.09 ⁺	-0.07	0.08	-0.23	0.06***
50-59 歲	0.05	0.08	-0.12	0.07	-0.16	0.05**
教育程度 (低)						
中	0.03	0.07	-0.10	0.06	-0.13	0.05*
高	-0.14	0.08	-0.28	0.07***	-0.14	0.06*
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0.02	0.01*	0.00	0.01	-0.02	0.01**
政黨傾向 (非建制派)						
無政黨傾向	-0.25	0.09**	-0.11	0.08	0.14	0.06*
建制派	-0.40	0.12***	-0.26	0.10*	0.14	0.08 ⁺
身分認同 (香港人)						
雙重認同	-0.17	0.12	-0.14	0.11	0.03	0.08
中國人	-0.05	0.09	0.04	0.08	0.09	0.06
個人經驗						
來往中國經驗	-0.02	0.02	-0.02	0.02	0.00	0.01
改善家庭經濟	0.06	0.04	0.04	0.04	-0.02	0.03
制度績效/中國效應						
香港政府評價	0.12	0.03***	0.18	0.03***	0.07	0.02**
中國大陸政府評價	-0.12	0.03***	0.11	0.03***	0.23	0.02***
經濟持續發展	0.02	0.03	0.06	0.02**	0.05	0.02*
貧富差距增加	0.06	0.03*	-0.02	0.02	-0.08	0.02***
無法維持現狀	0.09	0.03**	-0.07	0.03**	-0.16	0.02***
年度 (2013)	-0.34	0.11**	-0.28	0.10**	0.06	0.07
交互作用項 (* 年度, 2013 = 0)						
無政黨傾向	0.10	0.12	0.04	0.11	-0.06	0.08
建制派	-0.21	0.17	0.01	0.15	0.22	0.11*
雙重認同	-0.11	0.17	0.13	0.15	0.25	0.11*
中國人	-0.36	0.13**	-0.14	0.12	0.21	0.09*
來往中國經驗	-0.03	0.03	-0.02	0.03	0.01	0.02
改善家庭經濟	0.05	0.07	0.01	0.06	-0.03	0.04
常數	0.73	0.13***	0.15	0.11	-0.58	0.09***
Adjusted R ²	0.15		0.15		0.43	
F 值	13.15		14.07		54.57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樣本數為 1,857。括號內為參照組。

分與林宗弘（2014）的看法類似，他認為身分認同的本土化或移轉，將會影響個人對政治利益分配的認識，進而轉變為特定政治態度。以台灣為例，在中國大陸模型（b）中，泛綠傾向對中國大陸的政體評價較低，泛藍傾向、雙重認同或是中國人認同，對中國大陸政體評價則沒有顯著效果，這表示台灣在轉型本土化過程，的確形成了特定利益或態度分歧，但是，這樣的分歧並不一定完全會反映在對中國大陸的評價上。對香港民眾而言，卻是另一種影響方式，政黨傾向與身分認同連結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政體評價（建制派、雙重認同和中國人認同者，對香港政體評價較為負面，對中國大陸政體評價則較為正面），這反映了個人認同的移轉與政體評價的變化。

我們進一步加入了時間的因素來觀察，結果發現政黨傾向、身分認同與個人經驗，並不是影響政體評價的穩定因素，而是會隨着其他因素發生變動，進一步來說，政體評價本身就是不斷調整的過程，政體競爭可能會隨着時間的發展，而強化或弱化個人政黨傾向與身分認同，並產生潛在的影響。總的來說，從體制競爭的角度來看，政治社會化中的政黨傾向與認同因素，影響着台港民眾對中國大陸政體的評價差距；而制度績效 / 中國效應對台灣民眾來說，則是用來作為衡量 / 調整當前政體績效的標準，同時也沒有出現過度減損台灣民眾對自身政體評價的情況（模型 a）；對香港民眾來說，兩地政體的績效會相互提升，當香港民眾對香港政府與中國大陸政府有正向評價時，會增加兩地政體的評價，但是我們也發現，當經濟效果延伸負面的政治財（增加貧富差距與無法維持「一國兩制」時），則會減低兩地政體的評價，並增加政體評價的差距。

綜上所述，政黨認同與身分認同是影響政體評價與政體偏好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來往中國大陸經驗則值得持續關注。中國大陸的制度績效的確會成為台港民眾政體競爭意識中的比較來源，但就本研究的初步結論來看，制度績效 / 中國效應對台

灣民眾當前政體評價的影響有限，即使有實際的政體生活經驗，並不會因此提高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政體的評價（模型 b，結果不顯著）；對香港民眾來說，除了身分認同是重要的因素之外，維持現狀是否能夠獲得相對較佳的利益，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參考書目

- 中華民國行政院。2018。「對外貿易與投資：進出口貿易量」，3月30日 (https://www.ey.gov.tw/State/News_Content3.aspx?n=1DA8EDDD65ECB8D4&sms=474D9346A19A4989&s=8A1DCA5A3BFAD09C)。
- 王甫昌。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 王家英、尹寶珊。2008。《從民意看香港的社會與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吳乃德。1997。「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第1期，頁137-67。
- 吳重禮。2008。「台灣民眾威權懷舊的初探：蔣經國政府施政的比較評價」，《選舉研究》，第15卷，第2期，頁119-42。
- 林宗弘。2014。「中國效應：台灣與香港民眾政治滿意度的比較」，《文化研究》，第18期，頁178-87。
- 林宗弘。2017。「台灣青年世代的政治認同（1995-2015）」，《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49期，頁27-65。
- 林宗弘、胡克威。2011。「愛恨 ECFA：兩岸貿易與臺灣的階級政治」，《思與言》，第49卷，第3期，頁95-134。
- 林宗弘、曾惠君。2014。「戶口的政治：中國大陸與台灣戶籍制度之歷史比較」，《中國大陸研究》，第57卷，第1期，頁63-96。
- 林楠森。2014。「台灣數十萬民眾總統府前示威反服貿」，BBC 中文網，3月30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3/140330_taiwan_protest)。

-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7。「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要統計表」(<https://www.byccensus2016.gov.hk/tc/bc-mt.html>)。
- 香港貿易發展局。2018。「經貿研究：中國經貿概況」，7月16日 (<http://china-trade-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數據及指數/中國經貿概況/ff/tc/1/1X000000/1X09PHBA.htm>)。
- 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2009。「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影響台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第27卷，第2期，頁87-125。
- 陳陸輝、陳奕伶。2014。「兩岸關係與臺灣民眾政治支持的解析」，《民主與治理》，第1卷，第1期，頁87-109。
- 黃信豪。2011。「民主態度的類型：台灣民眾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分析」，《選舉研究》，第18卷，第1期，頁1-34。
- 鄒頌華。2014。「香港觀察：遍地花開的佔領行動」，BBC中文網，9月30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hong_kong_review/2014/09/140930_hkreview_hk_protest_spread)。
- 蕭新煌、尹寶珊。2013。「因應經濟危機與評估政府效能：2009年台港民意比較」，載楊文山、尹寶珊編，《面對挑戰：台灣與香港之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頁179-208。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neson, Richard J. 2003. "Debate: Defending the Purely Instrumental Account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1(1):122-32.
- Bratton, Michael and Robert Mattes. 2001.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Africa: Intrinsic or Instrumental?"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3):447-74.
- Carothers, Thomas. 2002.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1):5-21.
- Dalton, Russell J. 1999. "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in Pippa Norris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7-77.
- Diamond, Larry. 1999.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arry. 2002.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21-35.
- Diamond, Larry. 2008.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
- Easton, David. 1965.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 Evans, Geoffrey and Stephen Whitefield. 1995.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Democratic Commitment: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4):485-514.
- Fong, Brian. 2017. "In-between Liberal Authoritarianism a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Hong Kong's Democratization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1997-2016," *Democratization*, 24(4):724-50.
- Freedom House. 2018. "Freedom in the World Data and Resources: Country and Territory Ratings and Statuses, 1973-2018" (<https://freedomhouse.org/content/freedom-world-data-and-resources>).
- Griffin, Christopher G. 2003. "Democracy as a Non-instrumentally Just Proced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1(1):111-21.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7.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Jennings, M. Kent. 200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Russell J. Dalto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9-44.
- Klingemann, Hans-Dieter. 1999. "Mapping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1990s: A Global Analysis," in Pippa Norris (ed.),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1-56.

-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2002.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51-65.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 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Doubleday.
- Mishler, William and Richard Rose. 2007. "Generation, Age, and Time: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Learning during Russia's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4):822-34.
- Norris, Pippa. 2011.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gowski, Ronald. 1974. *Rational Legitimacy: A Theory of Political Suppo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e, Richard, William Mishler and Christian Haerpfer. 1998. *Democracy and Its Alternatives: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Rose, Richard and Doh Chull Shin. 2001. "Democratization Backwards: The Problem of Third-wave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2):331-54.
- Rustow, Dankwart A.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3):337-63.

附表 1：自變項測量與編碼處理

自變項	問句	編碼處理
年齡	台：請問您是民國哪一年出生的？ 港：請問您今年幾多歲呢？	29 歲及以下； 30-39 歲；40-49 歲； 50-59 歲； 60 歲及以上
教育程度	台：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 港：請問您的教育程度去到哪裏呢？	高：大學及以上； 中：高中、專科； 低：初中及以下； 拒答設為遺漏值
平均收入	台：請問您自己目前每個月的平均收入大概是多少錢？ 港：請問您全家平均一個月所有的收入加起來大概有幾多錢呢？	遺漏值設為中位數
政黨傾向	台：台灣有許多政黨，請問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 港：在香港的政黨之中，例如民主黨、民建聯、自由黨、公民黨、社民連、新民黨、人民力量和工黨等，您最支持哪一個呢？	泛藍；泛綠；中立 建制派；非建制派； 無政黨傾向
身分認同	台：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兩者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 港：在考慮到您身分時，您認為您自己是香港人多些，還是中國人多些呢？	台灣人；中國人； 雙重認同 香港人；中國人； 雙重認同
來往中國經驗	台：去年 (2012/2015) 一整年，請問您有沒有去過中國大陸 (不含香港和澳門)？ 港：您在 2012/2015 年有沒有去過內地呢？如果有，去過幾次呢？	0 至 6 次 (6 包含 6 以上) 0 次；1 次；2 次； 3 次；4-11 次；12 次及以上

附表 1：自變項測量與編碼處理（續）

自變項	問句	編碼處理
改善家庭經濟	<p>台：請問您認為目前為止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對您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p> <p>港：您認為目前內地與香港經濟關係的發展，對您家庭經濟狀況的影響是好還是壞呢？</p>	-2 至 +2 連續變項 很好的影響；好的影響；沒有影響（含沒意見）；壞的影響；很壞的影響；拒答設為遺漏值
政府評價	<p>整體來說，請問您對台灣政府的評價好不好？</p> <p>請問您對香港特區政府的評價好不好？</p> <p>請問您對中國大陸政府的評價好不好？</p>	-2 至 +2 連續變項 很好；好；其他 / 沒意見；不好；很不好；拒答設為遺漏值
經濟持續發展	<p>台：有人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會一直維持快速的發展」，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p> <p>港：有人認為「內地經濟會一直維持快速發展」，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p>	-2 至 +2 連續變項 很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很不同意；拒答設為遺漏值
貧富差距增加	<p>台：請問您認為兩岸經濟關係愈來愈密切，這樣會擴大或是縮小台灣的貧富差距？</p> <p>港：您認為內地與香港經濟愈來愈密切，是會擴大還是收窄香港貧富差距呢？</p>	-2 至 +2 連續變項 擴大很多；擴大一些；沒有影響（含沒意見）；縮小一些；縮小很多；拒答設為遺漏值
無法維持現狀	<p>台：請問您認為兩岸經濟關係愈來愈密切，那麼台灣在政治上要維持現狀會變得比較容易還是比較困難？</p> <p>港：您認為內地與香港經濟愈來愈密切，要維護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會容易很多、容易一些、困難一些、還是困難很多呢？</p>	-2 至 +2 連續變項 容易很多；容易一些；沒有影響（含沒意見）；困難一些；困難很多；拒答設為遺漏值